

历代抒情诗选



历代抒情诗选

吴奔星
选注

湖南人民出版社

历代抒情诗选

吴奔星选注

责任编辑：陈仿彝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衡阳日报印刷厂印刷

•

1983年6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二次印刷

字数：290,000 印张：16 印数：48,001—73,000

统一书号：10109·1571 定价：1.20元



前 言

我国的抒情诗有三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汉民族文明史开始之日，也即抒情诗流传之时，这是很可自豪的事。

我爱读抒情诗，它不仅有“兴、观、群、怨”的社会效果，还能陶冶性灵，满足美感享受的需要。推己及人，想广大读者亦有同感。

我一向喜爱抒情诗，而集中精力欣赏历代抒情诗，却是近三十年间的事。

从一九五七年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几乎有二十二个漫长的寒暑，孤独与寂寞围困着我，侵蚀我的健壮的肌体，挫伤我的奋发的精神。每当风晨雨夕，举目无亲，“寂寞”撕裂着心灵，坐立为之不安。正如奥地利著名小说家茨威格（1881—1942）所说：“再没有比在人群中孤独着更可怕的了。”为了打发难熬的岁月，不是呆望星斗，就是绕室彷徨，有时竟将童而习之的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反复吟哦。觉得情意缠绵，仿佛为我写照。于是，我就断断续续地欣赏起历代诗歌来，边读边背，边背边抄，觉着有些意义。但由于时间不能由自己支配，较长的诗，特别是叙事诗，费时误事，只好割爱，专读短篇抒情诗。如五七言律绝

和长短句的词、曲，看两三遍，就能成诵。日积月累，居然抄集了几百首抒情短诗，随手翻阅，爱不忍释，似乎屈原站在眼前，曹植站在眼前；还看见李白、杜甫联袂而来，李后主、李清照并肩而立；文天祥的昂首挺胸，秋瑾的迎风玉立，姿态都很动人，有如良师益友，少长咸集。既读古人之诗，就与古人为友，共悲欢，同离合，时而击节低吟，时而饮泣长叹，几乎别有天地，受创的心灵也得到些慰藉。打倒了林彪、“四人帮”，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传统文化，得到尊重，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文艺园地，百花盛开，古典诗歌的名篇佳作，更是广为流传，脍炙人口。我虽年迈，亦觉青春焕发，可以放手做点学问了。现在，我手捧《历代抒情诗选》呈献给伟大的人民和敬爱的党，希望借此稍稍减轻我二十多年未能为社会主义事业尽力的内疚，并愿此书的问世，能有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一

诗，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本职在抒情。现代著名诗人郭沫若早在一九二〇年初写给宗白华的一封信中，就明确指出：“诗的本职专在抒情。”（《论诗三札》）到三十年代中期，他又说：“诗歌的形式当用以抒情。”（答蒲风问）从我国历代诗歌的发展看，他的观点是完全符合实际的。诗的确是专门用以抒发感情的文学形式。凡是诗没有不抒情的，诗不抒情就不是诗。即使是叙事诗，也要抒情，单是叙事之作，不能成

其为诗，纵使分行排列，押着脚韵，也不能算诗。我国的古籍《尚书·舜典》早就说过：“诗言志，歌永言。”《毛诗·序》加以引伸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郭沫若认为这是关于诗歌的“一个很周到的定义”。（《诗歌底创作》，一九四一年。）的确，只要看“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两句话，就阐明了“诗的本职专在抒情”的具体过程，是从“情动于中”开始，到“形于言”（用语言表达出来）完成。假如“情”不“动于中”，就不能“形于言”，就没有诗。可见感情对于诗的创作的重要性。与此同时，这个定义也指出了诗所抒发的是“志之所之也”的“志”。“志”是符合一定方向的思想感情，或者说是在一定思想指导下的感情。古今中外的优秀诗人无不抒发有思想的感情。但是，抒情诗的主人公并不以他所属阶级的代言人的身分，抛头露面地陈情说教。尽管任何诗的内容都打下了一定阶级的烙印，诗人却并不使人一望而知他是某一阶级的代表或“号筒”。凡是好诗，总要通过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和文学语言，抒发感情，如爱情、友情、乡情以及其他方面的感情，至于属于哪一阶级、阶层的感情，诗人并不直接道破，而是让它含蓄于诗的意境与形象中，让读者在欣赏过程中体会出来。

爱情、友情和乡情是历代抒情诗抒发的主要感情。

抒发爱情的诗，在《诗经·国风》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写得很出色，真挚自然，传诵迄今。古代的许多无名氏歌

手，处理爱情这个“永恒的主题”，是很高明的。除了对少男少女的热恋加以绘声绘影的渲染外，还描写了妇女们的相思以及失恋与失意的苦闷，悲欢离合，兼而有之。如卓文君的《白头吟》、李白的《春思》、杜甫的《佳人》、元稹的《遣悲怀》、李商隐的无题诗、杜牧的某些绝句以及陆游的《沈园》，都是古来传诵的名篇。其中特别令人同情的是抒发宫女怨恨的所谓“宫怨”之类的抒情诗。它们揭露帝王的荒淫逸乐和宫女的不幸命运，是非常生动而又深刻的。例如历代诗人吟咏王昭君的诗达几百首之多，都是谴责封建帝王的。“宫怨”一类作品以唐代为最多，也以唐人之作为最好。元稹的《行宫》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和最富概括力的一首。它以毫不经意的笔墨，不动声色地对封建社会的宫女制度的持久性与残酷性，进行了极其生动而又深刻的揭露，与杜牧所说的“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阿房宫赋》），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能产生令人惊心动魄、怒发冲冠的社会效果。

抒发友情是我国历代抒情诗中常见的另一个主题。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中国人民是最重友谊的。在封建社会，即使是卖艺四方识字不多的人，也要讲讲江湖义气；至于那些游宦异乡，遭受贬谪，落魄江湖的封建知识分子，就更加重视友情，留下了不少传诵千古的优秀诗篇。如南朝陆凯的《赠范曄》、初唐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盛唐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杜甫的《梦李白》、中唐柳宗元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白居易的《欲与

元八卜邻》、清末章炳麟的《狱中赠邹容》……都是一往情深、千古不朽的传世名篇。

至于乡情，就更为广泛，有抒发家人父子夫妇兄弟骨肉相互怀念之情的。如东汉蔡琰的《胡笳十八拍》、隋薛道衡的《人日思归》、唐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李白的《静夜思》、杜甫的《羌村》、《月夜》、李益的《喜见外弟又言别》、白居易的《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李商隐的《夜雨寄北》等。有抒发去国怀乡、吊古伤今之情的。如汉王粲的《七哀诗》（“西京乱无象”）、唐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岑参的《逢入京使》、贾岛的《渡桑干》、宋文天祥的《金陵驿》、金元好问的《岐阳》、元萨都刺的《大同驿》、《越台怀古》、清秋瑾的《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等。有抒发山水田园之情的。如晋陶潜的《归园田居》、北齐的《敕勒歌》、唐王维的《鹿柴》、孟浩然的《过故人庄》等。

从抒发乡情的许多抒情诗看，爱家、爱乡和爱国的感情是一致的，描写田园、边塞与歌颂祖国的壮丽河山、反抗外来侵略也是一致的。

除了抒发爱情、友情和乡情外，我们历代的诗人，还从各自不同的地位、处境、遭遇和理想出发，抒发了形形色色、各不相同的感情，涌现了大量的抒情名篇。

只要接触一些历代抒情诗，大家就会同意郭沫若的论断：“诗的本职专在抒情。”特别是作为历代抒情诗的高峰或重点的唐诗，更为这一论断提供了有力的论据。唐诗绝大部分

是抒情诗，即使是叙事诗，也为浓重的抒情气氛所笼罩。唐代抒情诗其所以能独树一帜、擅场千古，不是偶然的。首先是因为唐代大多数诗人都能摆正“事”与“情”的关系。事不可无，但能力避堆砌；情不可少，但能力避凝固。情因事发，决不无事生情。叙事适可而止，情才真切动人。

其次，唐代诗人最能摆正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关系。唐诗一般总是突出生活形象，抒发真情实感，很少无病呻吟。他们也议论风生，并不排斥逻辑思维。杜甫、韩愈，虽为后人所诟病，说他们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学力为诗，但他们的代表作，形象思维仍占优势，辅以逻辑思维，诗的意境就更见深沉。杜甫的《秋兴》八首是最能摆正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典范之作。韩愈的《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一诗，虽以议论入手，但形象仍极生动，也是摆正了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代表作。

还有，唐代诗人大抵直抒胸臆，感情真挚，加以用典较少，不矫揉造作，能产生沁人心脾的艺术效果。杜甫、韩愈、李贺、李商隐等虽用典较多，但是，凡是他们脍炙人口的作品，并不堆砌太多的典故。古近体诗进入宋朝，经历元明清，大多因用典过多，议论过多，情思窒塞，显得枯槁，诗的艺术生命力基本上萎缩了。宋元明清的抒情诗，除了广义的词、曲，可谓划时代的创新之外，有一个共同的不良倾向，即对于唐诗，不是创造性的加以发展，而是生硬地进行模拟，特别是喜欢模拟杜甫和李商隐。从北宋时期的西昆体、江西诗派开始，一直到清末的同光体，不是宋人模拟唐

诗，就是清人模拟宋诗，在体裁形式和艺术风格上都谈不上创新。他们不仅按谱填词，也把近体诗当成词的一种，按谱填诗。所以鲁迅说：一切好诗，到唐已经做完，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当然，宋元明清也有优秀的抒情诗，但从总的发展趋势看，从诗贵创新的要求看，宋元明清的抒情诗，其艺术生命不是健旺，而是衰歇。话虽如此说，但是，从包括宋元明清在内的历代诗歌看，还是充分地证明着：“诗的本职专在抒情。”中国的诗史和西方相比，差别很大。中国诗史是从抒情诗开始的，产生于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前六世纪的第一部抒情诗选集《诗经》是它的显著的标志。西方诗史是从史诗、叙事诗开始的。公元前九至八世纪古希腊的行吟诗人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它的显著的标志。中国古代没有史诗——叙事诗，也没有剧诗。《孔雀东南飞》、《木兰辞》之类的叙事诗，都是东汉至南北朝的作品，而且抒情的气氛也十分浓重。如果要追究中国古代其所以没有叙事诗的原因，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在公元前的春秋（前770—前476）战国（前475—前221）时代，作为记事工具的散文已经很发达。从世界范围说，没有比我国的散文的发生与发展更早的了，这是中国文化的骄傲。在春秋、战国时代，我们已经有了后来当作经典著作看的《诗》、《书》、《易》、《礼》、《春秋》，除《诗》外，都是散文，保存了许多古代史料，所以后代学者有“六经皆史也”的说法。至于战国更是史家所艳称的百家争鸣、文化昌明的黄金时代。诸子百家的著作也保留了不少史料。正因为我国古代有成套的散文著作

反映古代中国人民的生活、思想和斗争，也就没有必要去创作长篇叙事诗了。只有认识了中国诗史的开端不同于西方的这一特点，才会进一步明确“诗的本质专在抒情”是特别符合我国国情的一个科学论断。

二

我国历代抒情诗，丰富多采，开创了众多的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从而也涌现了许多光照文坛、影响深远的诗歌流派。

《诗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歌选集，虽然谈不上有意识地形成诗歌流派，但从《国风》的《伐檀》等诗歌的刚健、清新、自然、真挚的艺术风格看，其中似乎也该有鲁迅所说的“杭育杭育”派。鲁迅曾经指出：“《国风》里的东西，好许多也是不识字的无名氏作品，因为比较的优秀，大家口口相传的，此外消灭的正不知有多少。”（《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如《伐檀》《硕鼠》之类的诗歌，既表现了不满统治阶级的思想倾向，也创造了大体一致的艺术风格。《国风》中的诗歌，多抒发爱情、友情和乡情，特别是对爱情的抒发，既大胆，又蕴藉，前人评之曰：“《国风》好色而不淫”，确切地表现出《国风》艺术风格上的主要特征。如果我们不是有意抹杀它们，就该承认“无名氏”的“杭育杭育”派，是我国民间最早形成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

《楚辞》是紧接《诗经》之后的一部抒情诗的选集，收集了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的骚体诗。骚体诗的风格是屈原的

《离骚》开创的。由于《离骚》的“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于是从战国到两汉，产生了不少骚体诗。骚体诗既创自屈原，后人“以原楚产，故称《楚辞》”。《楚辞》“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以上引文见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屈原及宋玉》），具有独创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直接影响了宋玉、唐勒、景差之徒，发展到两汉，王逸作《楚辞章句》，骚体诗便成为我国文人的第一个浪漫主义诗歌流派。

两汉至魏晋是五言诗的发生、发展时期。如果说《诗经》以四言为主，《楚辞》以六言为主，那末，发生于两汉、发展于魏晋的五言诗，也是抒情诗在形式上的创举，不可不加以重视。一般认为五言诗的产生当在西汉后期或东汉初期。如《古诗十九首》，非一时一地一人之作，约产生于东汉初期。到汉末建安时期，曹操和曹丕、曹植父子三人，以其政治影响驰骋文坛。除曹操写一点四言诗，曹丕写一点七言诗外，五言诗独擅诗坛。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和刘桢等七人，才华横溢，推波助澜，并称“建安七子”。他们面向现实，创作诗歌，从乐府民歌吸取营养，揭露社会动乱，同情民生疾苦，使五言诗形成一个高峰。由于情辞慷慨，格调激昂，语言刚劲，当时的五言诗开创了后人称为“汉魏风骨”或“建安风骨”的艺术风格，成为我国文人的第一个现实主义的诗歌流派。

从曹魏末年（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到西晋，是五言诗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技巧的转变期。当时社会动乱，斗争激

烈，人人自危，难安生业。从而老庄哲学盛行，出世思想严重。一些正始名士，“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文心雕龙·明诗》）刚健慷慨的“建安风骨”开始消沉，只有嵇康、阮籍等少数杰出诗人，尚能坚守。他俩属于魏晋之际的“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贤因“相与友善，游于竹林”而得名，但留传的诗太少，看不出大体一致的艺术风格，不算诗歌流派，只是一个不满现实的文人团体。嵇康与阮籍尤其愤世嫉俗，往往以含蓄、隐蔽的手法，抒发对现实的不满情绪。阮籍的《咏怀》是我国诗史上著名的抒情组诗。

进入两晋，产生了伟大的诗人陶潜。他因不满现实，写成《桃花源记》，借古讽今，寄托理想。他虽表扬“刑天舞干戚”，却难言行一致，只能饮酒吟诗。他的田园诗歌，语言自然，境界幽远，风格冲淡，卓尔不群，是“建安七子”以后五言诗的另一高峰。除陶潜外，其他诗人如所谓“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着重锤炼字句、追求华词丽藻，内容空疏，建安风骨，荡然无存。

进入六朝，虽有谢灵运、谢朓、鲍照等著名诗人，但绮丽浮艳的诗风，如风吹草掩，积重难返。不论元嘉体（元嘉，南朝宋文帝年号）、永明体（永明，南朝齐武帝年号）、齐梁体、徐庾体（徐庾指南朝梁代的徐摛、徐陵父子和庾肩吾、庾信父子），说法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的倾向：词藻华靡，内容空疏。刘勰说的“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山水

方滋，丽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虽然讲的是“宋初文咏”，实际概括了整个六朝抒情诗的形式主义倾向。

六朝的五言诗，虽然在理论上取得声调与格律的成果，但在实践上却助长了绮靡浮夸的诗风，未能形成诗歌流派。虽然，谢灵运等人的模山范水，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也只开了山水诗的先河。多数诗人的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毕竟不同，难于划为同一个流派。

进入唐代，新兴的近体诗的逐步完成与发展壮大，揭开了中国诗史的光辉灿烂的篇章。

初唐是近体诗五七言律绝宣告完成并开始成熟的时期。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等四人的诗篇，还残余着六朝绮靡柔弱的诗风，但因毕竟结束了隋末大动乱的局面，诗人开始面向现实，不复专门在词藻声律上下工夫。杜甫称赞“王杨卢骆当时体”，指责“轻薄为文哂未休”（《戏为六绝句》）的人，表现了对历史的尊重。后人根据王勃等四人在诗创作上的杰出成就，称他们为“初唐四杰”，可以说是抒情诗的一个流派。

进入盛唐，抒情诗的领域出现了两座高峰：浪漫主义的李白与现实主义的杜甫。他们的成就博大精深，具有各自的独特风格。李诗飘逸、豪迈，杜诗沉郁、顿挫。后人争相学习，只能得其一偏，难与李杜比肩，形成流派，李杜也就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辉耀千古。后人所说的“盛唐气象”，主要是由李杜开创的。李杜虽非任何诗歌流派的代表诗人，却

如鹤立鸡群，昂首天外，独步今古，影响深远。

盛唐抒情诗的流派，主要是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田园山水诗派和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王、孟继承、发展陶渊明、谢灵运的优良传统，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发展并丰富了唐诗的“盛唐气象”，在中国诗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进入中唐，白居易、元稹倡导新乐府运动，关心人民疾苦，密切注视现实，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反对毫无寄兴的“嘲风雪，弄花草”的作品。他们所作诗歌，发展了五七言古风，情调激昂慷慨，语言通俗平易，相传老妪能解，影响广泛。由于他们活跃在唐宪宗和唐穆宗时代，因而被称为元白体或长庆体。

至于文学史家所说的“大历十才子”，一般指活跃在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的十位诗人：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和李端（据《新唐书·卢纶传》）。十人姓名所传不一，诗歌风格也不相似，并非一个诗歌流派，但其中多数人却写出了传诵一时的抒情诗。

唐诗向中晚唐发展后，虽出现了不少有成就的诗人，如韩愈、柳宗元、韦应物、刘禹锡、李贺、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等，但风格各异，没有形成什么流派。

进入宋代，五七言律绝的抒情诗不如唐朝那么独擅诗坛，被新兴的长短句取而代之。婉约派与豪放派，如双峰并峙，二水奔流，是宋代文学的光辉代表。至于古近体抒情诗

方面虽先后出现西昆体和江西诗派，产生一定影响，但成就不大。西昆体活跃于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以杨亿、刘筠、钱惟演、李宗谔等为首的十七位诗人，师法晚唐李商隐，互相唱和，编成《西昆酬唱集》二卷，故以命名。至于江西诗派则是北宋末年的一个诗歌流派，吕本中作有《江西诗社宗派图》，黄庭坚为首，共二十五位，多为江西人。他们要求做诗字字有来历，倡导“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法，但往往袭用前人诗意而略改其词，炫耀工巧，实际是变相抄袭，而非独出心裁的创作。宋诗虽不乏佳作，但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雕章琢句，模拟唐人，却是通病，不必为之掩饰。

抒情诗发展到元明清，除了元人散曲是另一种创造性的新兴形式外，对自由诗五七言歌行和格律诗五七言律绝，既无发展，更无突破。虽然也出现过元好问、萨都刺、高启、吴伟业、王士禛、黄景仁、龚自珍、黄遵宪等有成就的诗人，但未产生有影响的流派。除了长短句方面产生过朱彝尊开创的浙西词派和张惠言开创的常州词派外，在古近体抒情诗方面就只有晚清的同光体和南社。同光体是指同治和光绪年间一些模拟宋诗的诗人如陈三立、陈衍、沈曾植等，他们是清朝遗老，不满民主革命，陈衍的《石遗宝诗话》可以看出同光体的理论和实践的基本倾向。

至于南社是辛亥革命前夕出现的文学社团，发起人为柳亚子、陈去病、高旭等，一九〇九年成立于苏州，主张“操南音不忘其旧”，故名南社。他们反对清朝的封建统治，鼓吹民主革命，倾向相同，风格相近，可以称为历代抒情诗的最

后一个现实主义诗歌流派。

以上对历代抒情诗的流派作了一个极其粗略的勾勒。我完全同意鲁迅所说“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以不必动手。”（《鲁迅书信集·致杨霁云》，一九三四年。）这虽然并不否定宋元明清的优秀诗篇，但唐诗却是抒情诗的高峰与重镇。自唐以后，除宋词元曲外，抒情诗（五七言律绝和古风）是走向衰歇的。

三

诗，从形式看，不外两大类型，自由诗和格律诗。中国历代抒情诗的形式，经历了从自由诗体到格律诗体的发展过程。

《诗经》三百篇搜集了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前七世纪大约五百年间的民歌，是我国第一部最古老的抒情诗选集。鲁迅说：“孔子究竟删过《诗》没有，我不能确说，但看它先‘风’后‘雅’而末‘颂’，排得这么整齐，恐怕至少总也费过乐师的手脚。”（《集外集·选本》）的确，从风、雅、颂三部分看，《诗经》不仅经历过严格的筛选，亦曾加以审慎的编排。不论编选者是谁，都反映了两千五百年前我国已有一些爱好诗歌与音乐并具有较高鉴别能力的编辑人员。《诗经》虽以四言诗为主，但从语言的活泼、行节的参差看，都是自由诗体。诗歌的起源，当从自由诗开始。《诗经》的自由诗形式，是符合诗的发展历史的。

《楚辞》是东汉王逸编注的，收集了以屈原为代表的从